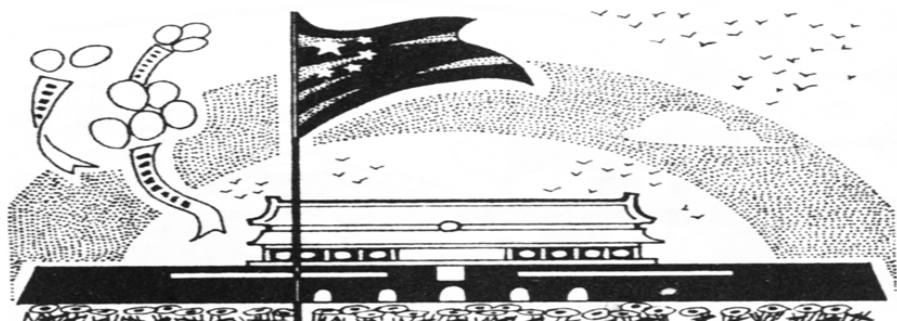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一）

阎新 编著



目 录

1924 年	1
1925 年	5
1926 年	12
1927 年	20
1928 年	31
1929 年	35
1930 年	39
1931 年	44
1932 年	50
1933 年	54
1934 年	58
1935 年	63
1936 年	69
1937 年	74
1938 年	85
1939 年	90
1940 年	96
1941 年	101
1942 年	107
1943 年	110
1944 年	116
1945 年	121
1946 年	130
1947 年	136
1948 年	143
1949 年	154

1924 年

1 月初，中共中央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陈独秀、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出席了会议。

1 月 20 日至 30 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 10 名共产党员为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着又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共产党人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农民部的部长，工人部实际上也由共产党员领导。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右派分子方瑞麟等反对共产党员“跨党”，主张《章程》中增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本党”。李大钊当即发言驳斥，严正指出：“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李大钊的声明举起孙中山联共政策的旗帜，严正地表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原则立场。他的发言得到廖仲恺等大多数代

表的支持，否决了右派的提案。

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三届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决议说：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中的“极腐败的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努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决议中关于共产党对待国民党右派的态度，实际上是主张调和、退让；关于共产党的活动，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些主张，助长了党的工作中右的偏差的发展。月底，李大钊从广州回到北京，担任国民党北方地区的领导工作。

5月5日，设立在黄埔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员开始入学。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先后在该校担任政治领导工作以及其他工作。中国共产党还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其中许多人成为军校的骨干。黄埔军校是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建立的训练革命军官的学校，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为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军官。

5月10日至1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5个月以来的成绩，指出了国共合作实现以后共产党内出现的右倾偏向，认为“只有发动工人参加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这次中央扩大会议提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复杂环境中，要认识巩固我们党的重要。会议强调要坚持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以这个政纲作为标准来正确对待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以经常地普遍地宣传和实行这个政纲来扩大国民党组织，加强左派，削弱右派，并批评前一段工作中对两派采取

调和政策的错误。会议提出共产党自身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在产业工人中大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批评前一段“没有十分努力去吸收工人”的错误，并制定了加强党的工作的具体措施。会议指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建立和扩大工会的组织，发展劳动运动，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会议还按照不同情况，对在工会运动方面如何帮助国民党作出一些具体规定。这次会议，对于纠正党在前一时期工作中的右倾偏向，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正确处理同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关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会议根据同国民党右派争夺工人运动领导权的复杂情况，适当调整了党的工会活动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使党在开展独立活动时不至受过分的束缚，能够保持有灵活机动的余地。

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王荷波、彭述之、刘清扬出席了大会。大会强调了殖民地国家的统一战线问题，指出在同上层谈判时，共产党必须保持彻底而绝对的独立性。大会批判了统一战线工作中“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倾向。李大钊在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时作了发言，介绍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活动以及中国民族运动的发展情况。

7月3日，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正式开学。在共产党人的主持下，农讲所至1925年12月连续举办了五届，彭湃、阮啸仙、罗绮园、谭植棠分别担任各届农讲所主任，为广东及附近省区共训练了农运骨干450多人。

7月15日，广州沙面数千工人举行罢工，反对英、

法帝国主义“不准中国人自由出入租界”的“新警律”。罢工坚持一个多月，取得胜利。广州工人乘胜组织工团军。

8月，广东农民运动有了发展，开始组织农民自卫军。

9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三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反对帝国主义，推翻直系军阀的统治。

10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推动下，孙中山依靠黄埔军校校军，联合工农武装和其他军队，镇压了英国买办陈廉伯率领的商团的反革命叛乱，给予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以有力的打击，使广东革命局势转危为安。

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推翻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皖系军阀段祺瑞任临时执政。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同情广东革命政府，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统一大业。

11月10日，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决定北上，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并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主张。

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努力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到年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这样，“二七惨案”以后处于低落状态的群众运动又开始复兴，预示着大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

11月，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在取得孙中山同意之后，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党团员担任骨干，组建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这是一支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

12月12日，广东省广宁农会在彭湃和周其鉴的领导下，发动农民开展减租运动，遭到地主武装的破坏。广东革命政府派铁甲车队前往广宁支持农民的减租斗争，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1925年

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大会回顾了二大以来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经过，肯定上年5月中央扩大会议对党的工作中右倾错误的批评，重新规定党同国民党合作和关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方面的一些方针。大会文件指出，国民党固然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但不是这个运动的全部。共产党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反对右派、争取中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坚持同他们的妥协性作斗争。大会研究了工人运动与民族运动相结合的关系，强调在民族运动中力争工人运动的独立及进展，以取得领导地位，并使民族运动充分地革命化。为此，工人阶级就必须有强固的群众性的工会组织，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组织在共产党指导之下。对工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会区别情况规定了不同的办法，并指出要同工会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影响、同国民党右派的分裂阴

谋作斗争。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并决定在全国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四大的缺点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分析，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阶级，这就把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弄得模糊不清，其结果或者是把所有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敌人，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的原则区别；或者是无视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营垒中的活动，放弃无产阶级同它争夺领导权的任务。大会对于如何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也缺乏正确的方针，只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大会修改了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陈独秀被推举为总书记。

1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动员全体团员贯彻党的四大决议，积极发展青年学生运动，并决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选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太雷被选为总书记（1926年任弼时为代理书记）。

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3月，东征军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

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日本纱厂4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

3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4月16日，

大会闭幕。大会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对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和组织大纲等作出了决议。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共两党组织各界民众进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全国规模的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

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岛日本纱厂1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

5月1日至9日，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同时举行。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它代表166个工会，共拥有有组织的工人54万。大会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工农联盟、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及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等决议案。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林伟民、刘少奇、苏兆征、邓中夏等25人为执行委员。同日，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泽生为副委员长，并组织干事局，林伟民兼总干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广东的工农运动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5月初，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各地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这时也进一步活跃起来。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比较普遍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从而为行将来临的大革命风暴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大班(厂长)率领打手枪杀中国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顾正红，打伤多人，工人罢工反抗。上海学生援助工人，租界巡捕进行逮捕。租界当局还损害中国工商业者的利益，宣布要在上海增加码头捐、实行交易所注册等。这就进一步激起了工人、

学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愤怒。

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为了加强工会的组织力量，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刘少奇到达上海，也参加了上海总工会的领导。

5月30日，上海学生及其他群众代表举行反帝游行、讲演，租界巡捕开枪镇压，酿成“五卅”惨案，死10余人，伤多人。当晚中共中央再一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向帝国主义反击。

6月1日，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华任副委员长。同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及告全体工友书，宣布为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上海学生宣布举行罢课，商人宣布举行总罢市。帝国主义对起来反抗的上海人民群众继续进行疯狂的屠杀。但是压力愈大，反抗力愈强。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革命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北京、广州、青岛、武汉、天津、唐山、南京、九江、长沙、重庆、郑州等许多城市约有1700多万群众，不顾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残酷镇压，先后起来响应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其中有从6月19日起举行的省港大罢工，参加这次大罢工的有广州沙面租界和香港的工人20万，7月6日在广州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组成了有数千人的工人纠察队。罢工委员会行使了部分政权职能。委员会由香港罢工工人代表7人，沙面罢工工人代表4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1人组成，苏兆征任委员长。这次罢工

使繁荣的香港变成“死港”，严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数十万罢工工人成为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有力支柱。省港大罢工在广东人民和革命政府的支持下坚持了将近两年。同时，广东、湖南、河南等省的部分农民群众，也积极参加了五卅运动。

7月8日，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将黄埔军校校军扩大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其他所属各军也统一改称为国民革命军。湘军为第二军，谭延（门+岂）任军长；滇军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粤军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第五军和第六军的军长分别为李福林和程潜。在各军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廖乾五、林伯渠分别担任第一、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或副党代表。

7月23日，戴季陶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成为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新老右派反共的思想武器。8月间，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人先后发表文章，批判反动的戴季陶主义，明确指出：离开阶级斗争，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法使工农奋起，使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得到民权；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

8月20日，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

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自五卅运动以来的斗争经验，确定了党在革命高潮中领导工农群众运动的方针，讨论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国共两党关系、党的

组织和宣传工作、党的军事工作、农民土地等问题。会议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中国资产阶级有严重的妥协倾向，无产阶级已明显地站在领导地位；最近的革命运动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且是“力争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会议总结了五卅运动中工人群众受军阀武力摧残的教训，提出要“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最忠实的分子”，“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这表明中共中央已开始注意军事问题。会议重申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并提出制定农民问题的“政纲”，“其最终的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地主的田地交给农民”。会议明确指出：“如果农民得不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这是中共中央决议中第一次提出农民土地问题。这次扩大会议还讨论了国民党左右派的进一步分化和戴季陶主义出现的问题，明确指出戴季陶等人已“变成了新右派”。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决定继续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竭力赞助他的左派”，“努力反对右派”。但是会议又决定“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干部”。这个决定导致在以后的实践中放弃争取对国民党的领导权的后果。会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等文件，发表了《告农民书》。

10月1日，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东征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这次东征，在省港罢工工人和东江农民的支持下，很快收复了潮汕两地，11月初收复了东江，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上统一。这时，蒋介石已表露出要在军队中排斥共产党人的企图，

他无理要求周恩来交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名单。周恩来自汕头回广州，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认为应予蒋介石以回击，不再同蒋合作，另组国共合作的部队。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反对这一计划。只是由于周恩来等的努力，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才得以在广东肇庆以铁甲车队为基础建立起来。这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正规部队。

11月，国民党中央决定于次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选举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很大的优势。周恩来、陈延年主张利用这个有利条件，通过这次大会开除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党籍，惩处当时正在北京西山召开反共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共产党员应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压倒优势。这个计划遭到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陈独秀、张国焘等主张向国民党右派让步。他们同已被逐出广东的戴季陶、孙科等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谈判，请右派分子回广东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2月1日，毛泽东首次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以前，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等人也陆续发表了论述中国革命和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文章。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以及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文章中，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从而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初步提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主要是

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

12月5日,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出版。这是在国共两党合作的情况下,由国民党宣传部主办的一个刊物,其目的是要“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6年

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代表占很大优势,这次大会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在会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产党员担任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的主要领导职务,几乎全部掌握了这些关键部门的领导权。但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竭力主张妥协退让,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时,共产党作了很大的让步。在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7名,连本来应开除党籍的戴季陶等右派分子,在受了党纪处分以后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12名中央监察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1名,右派占绝对优势。这就为蒋介石篡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造成了有利条件。

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

会议确定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这时，国民军正在河北、河南同奉军、直军交战。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英、日帝国主义和奉直军阀反国民军的联合会战如果得胜，必然要进攻并推翻广州国民政府。会议指出，根本解决时局问题的途径，“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因此，“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必须在北伐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开展群众工作。会议还决定建立中央军委，以便加强党的军事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建立了军事部。陈独秀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

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军舰驶入大沽口，掩护奉军进攻天津，炮轰国民军，被国民军击退。16日，日本联合美、英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工事等无理要求。

3月18日，北京群众10余万人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执政府的卖国罪行。在执政府门前，卫队开枪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3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为“三一八”惨案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段祺瑞，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天津、上海等地人民群起响应，纷纷举行集会、示威。

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谎称共产党人指挥的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共产党要暴动，借以宣布戒严，派兵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有5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着矛盾。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产党

员。毛泽东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但陈独秀、张国焘等和共产国际代表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陈独秀又拒绝这一正确主张。

4月20日，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中共中央在致大会的信中指出，农民运动必须与全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相结合。同时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到农民大众的参加也不会成功。信中特别强调，农民运动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必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5月1日，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广东省第二次农民大会同时在广州举行。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举行了12天，通过了职工运动的总策略、组织问题及其运用方法、经济斗争的最近目标及其步骤等议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大会举行了15天，通过了农民运动在中国国民革命中之地位等21项议案。两个会议的代表举行了4次联席会议，通过了工农大联合等决议，还到广州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师北伐。

5月3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9月11日结业。这届农讲所由毛泽东任所长，高语罕任政治训练主任，肖楚女任教务主任，招收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00余名学员，为北伐战争中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准备了干部。

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谭延（门+岂）、蒋介石等9人联名向全会提出旨在

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这个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提案蒋介石事先取得了鲍罗廷的同意。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指导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时，大家意见不一致。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大家接受。从此，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换上了国民党右派分子，蒋介石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此外，蒋介石又通过国民党中央任命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按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出征动员令下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这样，蒋介石就垄断了党政军财大权。

5月20日，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奉命进入湖南，援助被直系军阀击败而拥护国民政府的唐生智，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6月4日，陈独秀发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为蒋制造三二〇事件辩护。声称从黄埔军校时期开始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并一再表白共产党绝无倒蒋之心。与此同时，鲍罗廷也于6月初在广州向全体苏联顾问作报告，专门分析三二〇事件发生和整理党务案通过之后，统一战线内部力量组合和相互关系的变化，继续推行对蒋介石的安抚退让政策。

6月1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致信中国共产党，提出根据“整理党务案”的规定，成立两党联席会议，并指派张静江、谭延（门+岂）、蒋中正、吴稚晖、顾孟余为国民党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随后，中共中央指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中共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

7月4日，国民党发表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